

新

本书以『新民』思想为出发点，呈现了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近代思想家们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的思想历程。

天

『新民』中国近代思想研究

刘胜梅◎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新民』

中国近代 思想研究

刘胜梅◎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异彩纷呈的诸多思想中,“新民”思想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它融国民性改造、近代感性精神、理性精神以及伦理精神的重建于一体,铸自由、平等等价值观于一炉。本书以“新民”思想为出发点,呈现了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近代思想家们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的思想历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新民”思想研究 / 刘胜梅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13-15575-7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2246 号

中国近代“新民”思想研究

著 者: 刘胜梅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5575-7/B

定 价: 45.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9.25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7602918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新民” 思想的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	013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社会危机下对人的精神层面的 反思	014
第二节 “新民” 思想的历史依据	022
第三节 “新民” 思想的理论基础	031
第二章 “新民” 思想的理论架构	055
第一节 鼓民力：近代感性生命的重建	056
第二节 开民智：近代理性精神的重建	069
第三节 新民德：近代伦理精神的重建	091
第三章 “新民” 思想的现实选择	113
第一节 国民性之根源探析：道德重建之先河	115

第二节 国民性之批判：道德重建之切入点	139
第三节 国民性之改造：道德重建之内容	152
 第四章 “新民”思想的逻辑进路	171
第一节 戊戌维新时期：国家之“新民”	173
第二节 从民初到“五四”：个体之“新民”	195
 第五章 “新民”思想的发展	223
第一节 从“五四”到当代：新人改造之成败得失	224
第二节 现代启示：公民与公共精神	253
 结 语	271
参考文献	272
索 引	283
后 记	288

绪 论

一、“新民”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思想博杂，异彩纷呈。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这一特殊境遇下，众多的思想家为摆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以救亡图存、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豪气，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瑰丽的篇章。他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所提出的诸多救国策略，引领了时代的潮流，逐渐形成之后汹涌澎湃的诸多思潮，在警醒国人的同时，亦成为近代史上一笔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新民”思想，即着眼于对人的塑造的救国路径，则是他们在这时期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可以为当今社会人的发展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时至今日，当物质的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的素质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人们。如何提升人的素质，使其不仅成为物质的富足者，而且成为精神的富有者，成为道德的践行者，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当我们追溯从晚清到“五四”众多思想家对“新民”思想的思考轨迹，以及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思想困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民”思想，的确是现代化发展不可能绕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进程

无疑是要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继而过渡到现代的过程相适应的。在这个过程中，鉴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人的现代化意味着受传统文化的纲常伦理禁锢达几千年之久的臣民逐渐摆脱束缚，在民族国家的谱系下被重新塑造为具有近代意识的新国民。应该说，新国民的塑造，首先是对其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而其塑造的理论依据则是进化论的引入，以及近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可以说，进化论的引入，确实是一场思想上的重大革命，它使传统文化中原本自足的一套集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诸多方面于一体的价值系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人已经不再是具有伦常道德的社会人，而是有着自然本性的高级动物，他已不再把完善自我作为人生的追求，而是要设法在这样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无情的世道中使自我保存下来。这样，在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性善论无疑被性恶论所代替，人与人之间已经撕去了温情脉脉的温良恭俭让的面纱，而代之以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原来维持数千年的儒家纲常名教所建构的礼的秩序彻底崩溃，代之以一种具有无限可能、富有无限生机的力的秩序。而能够在这样一种秩序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无疑是强者。这样，强者具有强权。由是，一种强者逻辑就产生了。正是在这种强者逻辑的支配下，如何富强就成为近代国人执著的追求。这个寻求富强的过程，随着 1895 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而实现了重心的转移，即从以器物为中心转向了以提高人的能力为中心，而人的能力的提高，其核心在于其德、智、力的提高和拓展。应该说，对于德、智、体三者的提高和改善，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并不新鲜，但晚清的思想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它们统统归结为“力”。这样，体力、德性、知性都成了促使个体胜出的作为生存能力之要素的力的元素，只有这三种元素中的每一项都能达到最强的状态，这三者的合并才能达到最强，个体也才能最有活力。而根据社会有机体原理，国家、社会作为有机

体，都是由众多个体所组成，只有每个个体最有活力，国家才能最强盛。这样，如何实现作为新国民要素的德、智、力三者之强，既是实现对其进行文化意识整合的关键，更是强国的关键。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就与追求富强之间具有了因果关系。

其次，作为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的“新民”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同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决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现实来看，“新民”思想的出现是国人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陷入阻滞状态而寻求的又一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思想家都积极地从理论上寻找思想资源来支持自己的思想，从对传统思想的变异、三世进化论到西方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说、宪政理论、自由民主以及科学知识与精神的自觉传播与运用，无不说明了这一点。西方思想以及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理论根基，赋予了“新民”思想以厚重的历史基调。应该说，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是近代思想家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在救亡的漫漫征途中的一线曙光，同时它也能陷入阻滞状态的救亡运动提供动力，从而将近代中国理性反思推向前进。也正是在这个探寻过程中，才能够认识到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意蕴，明确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实际上具有空间的整体系统性和时间的恒久持续性的意义。而有关“新民”问题的研究也正是探索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现实的基点，同时这个问题也是所有民族现代化发展不可回避的基础课题。

最后，“新民”思想不仅初步培养了国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科学意识，而且促进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它与反封建、反传统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相得益彰，促进了学者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反思。因此，研究近代“新民”思想，不仅具有彰显主体意识与人文关怀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创造性整合，更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国家要促进社会变革，就必须要加强国民的民主思想。例如，法国大革命中，就赋予公民充分的自由；而美国革命所具备的最重要特征，不仅是顺应人性，还在于对人性阴暗面的承认。而近代思想家们大力宣传自由、独立、平等、民主、权利等思想，正是为彻底改变旧国民性而实现的国民的思想变革和观念更新。他们所倡导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动摇了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而奉为主璧的观念意识，使国民的思想和精神风貌为之一新。这些思想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现代意识的觉醒，实现了国民人格的现代转型，启动了中国由一个人格依附的臣民社会向个性自由的公民社会的转型，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此外，思想家们还将国民与民族文化、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他们在探讨国民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强调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国民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要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国民必须具有爱国的自觉心，更需要自发的责任感与积极的参与精神。因而国民民族素质的培养就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当务之急。

应该说，以“新民”思想作为研究主题，将其置于从近代到当代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既富有挑战性，同时又有着极大价值的课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要从近现代声名显赫的诸多思想家的纷繁复杂的理论中概括出其总体发展的脉络，更要在领略思想家们融古今、中西文化于一炉的学术功底和思想睿智以及为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殚精竭智对国民主体文化心理进行重构的基础上，来理解和把握他们思想中所包含的解决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路：即从人的现代化入手，以文化为根基，以伦理为核心，通过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公民，来引导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中，因丧失了精神意义的存在而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人们，使他们在获得团体认同的同时，也找到其生存的意义。

二、“新民”思想与我国国民性研究的现状

国民性及其改造的问题，是“新民”思想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家们在近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对“新民”问题现实化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应该说，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一股热潮，当时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国民特性和性格而进行的，对国民性的界定也褒贬不一。

到了5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曾一度归于沉寂，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所需要的人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人们面前。这样，对于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国民性格重塑问题的思考，就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著作及文章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温元凯、倪端的《改革与国民性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是“十年动乱”之后，第一部立足于改革开放，比较系统地研究国民性的著作。该书在对国民性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国民性改造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以及影响国民性改造的诸因素，同时也对理想的国民性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郑欣淼的《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则是以文化为视角，对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个案研究。此外，沙莲香所著的《中国民族性》（一）、（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90年版），是对从1849—1986年国内外所有关于国民性、民族性以及东西方文化及其相关内容讨论的总汇，其中不仅有美、法、德、日、英等诸多国家的思想家对中国国民特性的总结，更有众多中国思想家的理性反思。应该说，这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问世，不仅激发了国内学者研究和探讨国民性的热情，而且也提供了研究国民性的可供利用的资源。

20 世纪 90 年代探讨国民性的论著相对较多,代表性的主要有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以及俞祖华《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前者站在历史与理性的高度来考察和审视国民性的近代历程、传统国民性的精神特质及自在表现,并对现代国民性的重塑进行了探讨。后者则从国民性反思的历史条件、发展脉络、主题内容以及近代民族反省的深远启示方面对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剖析,其中既有对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宏观考察,又有对启蒙思想家的个案分析。这两部著作进一步深化了之前的国民性研究。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的素质的提高问题进一步凸显,因而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也更加升温,相关的著作不断涌现。袁洪亮《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以人的现代化为视角,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发展历程做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近代知识界关于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基本内容、内在矛盾分析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予以归纳和总结,并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个案分析。此外,教军章《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阈及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是这一时期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又一力作。该书通过对国民性问题及其历史源流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梳理,阐释国民性概念蕴含的基本意义,分析近代中国国民性研究的理论成就和理论缺失,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层面揭示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指涉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多维意蕴,透视近代国人寻求主体自觉的心路历程。

青年历史学家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一书,从世界视野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发生了哪些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

正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把国民性的形成归结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

张锡勤的《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对国民性的内涵、近代国民性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改造国民性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把握。

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是近百年来学者们持续关注的话题。大多数学者都把国民性改造视为“新民”，但依笔者看来，“新民”与国民性改造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新民”的内涵更宽泛一些。“新民”是对国民从身体到精神上的塑造，而国民性改造则重在强调对国民精神的重塑。因而，把国民性改造作为“新民”思想在近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的现实选择似乎更为妥当。可以说，学术界对“新民”思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但鉴于“新民”与近代启蒙、中西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很多学者从政治学、道德、教育学、哲学以及现代性等不同角度对“新民”思想的内涵和必要性、“新民”的途径以及“新民”对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等进行了阐述。尽管这些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个案研究，且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但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事实上，对中国近代“新民”思想的研究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学术课题。它涉及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从总体模式来看，对这一时期主要人物的个案研究、群体研究、专题研究并存且呈互动态势，而关涉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近代化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对“新民”思想研究的日趋深化。但需要指出的是，此一学术研究有待改进之处亦难以回避。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论文多，著作少，呈现极不平衡的状态。此外，研究还呈现比较散漫而无体系的特征，运用或创

设较为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没有抽象出一个可供集中探讨的话题,这些无疑制约了该研究的深入进行。

第二,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想,“新民”思想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在概念的梳理、内容的概括、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想矛盾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比如,一些重要概念或观念还没有成为专门考察的对象。诸如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国家与国民之关系等,究竟是如何生成或演变的?其中的制约因素有哪些?这些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新民”思想以独特的色彩,并进而影响之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些近乎“语词”分析或“观念”解析的研究,对于揭示“社会”与“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都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在“新民”的构建方面,除了分别考察教育、舆论、文艺等传统改良方式和激进的革命手段之外,也要注意分析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对思想家们的相关经济和家族社会组织的改造思想,也仍然缺乏足够的研究。近代“新民”思想的实际效果如何?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民”思想的倡导者充满激情的呐喊无动于衷?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对少数精英人物的研究较多,学术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迄今为止,有关的“新民”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少数精英人物。在众多个案研究中,专著类个案研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于鲁迅,而论文类的个案研究较多关注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尤其是梁启超),相对忽略了其他同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在具体表述上,大都是围绕着“新民”的意义从政治学的角度展开。很显然,这些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过于单一,人物覆盖面比较狭窄,难以体现出当时社会思想变化更为广阔的层面。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扩大人物的研究范围,从而拓展研究视域,深化研究主题。

第四,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在既有的研究中,虽然有的成果涉及对不同流派、不同思想家或不同时期的“新民”思想的比较研究,但随着研究对象的日趋多元、研究专题的愈加细化,比较研究的空间还应该进一步增大。此外,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也作过大量研究,有的还对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产生过直接影响,这些人与中国启蒙思想家之间的比较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视角。而这些方面,现有的研究显然还不够。

第五,如何回应当代社会挑战有待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道德进步及其互动成为当代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当物质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层次,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人文危机,对道德功能的探讨以及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已经变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人的现代化与道德进步在今日已经成为文化界、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而且这些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作了颇有理论意义的探索,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当代人的现代化及其道德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传统意识形态近代化过程的延续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横向探讨应该如何完善的问题,也离不开纵向的历史总结。可以说,时代发展对研究中国近代人的现代化及其道德素质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回应伦理道德无用论,现有论著虽有所涉及,但还缺乏系统的论证。清末民初时人在此方面已有诸多争论,深入剖析其内涵,不难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本书以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为背景,对近代“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框架结构、国民性改造、逻辑进路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书正文分五章,各章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新民”思想的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新民”思想源于社会危机下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反思。当西方列强纷纷染指中国，昔日的东方大国雄风不再，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之时，洋务派、维新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救亡图存下从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的艰难探索。然而，他们的努力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下均宣告失败。在痛定思痛之后，近代思想家们终于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关键，不在形而下之用，而在其形而上之体，不着眼于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实现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的变革，任何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因而，作为人的近代化之取向的“新民”，就成为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所力图构建的理想人格。可以说，“新民”在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而且自其出现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伦理内涵，也正是它奠定了近代“新民”的伦理基调。正是围绕着“新民”的构建，才形成了近代轰轰烈烈的“新民”思想。而任何一种思想，势必要有其理论基础，“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作为其世界观基础的进化论和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近代功利主义。进化论实现了国人思想观念的革命，其在把人与天地万物同样置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宇宙进化论规律之下，在剥去人的道德外衣的同时，也使人们懂得：要想在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上存活，只有实现自强，自强才能保种，于个人、于国家皆是如此。而融中西功利主义于一炉的近代功利主义，则实现了国家价值观念的革命，它在使个体合理欲望的满足进一步合法化的同时，肯定了对功利的追求，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实现以利群为宗旨的群己利益的统一。这样，个体的自由、权利等价值观念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二章，“新民”思想的理论架构。“新民”思想由严复首倡。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试图从力、智、德的三重维度对国民的身体和精神进行重塑，从而开启了近代感性生命、近代理性精神和近代伦理精神的重建历程。

就“鼓民力”的提出来说，无疑是对传统文化崇文尚礼的阴柔特质的否定。严复及其后的近代思想家们在对传统文化造成民力衰微的症结进行揭示的同时，力图培养起国人的尚武尚力精神，并将其视为是感性生命重建的根基。为此，他们不仅对本民族的尚武传统予以充分挖掘，而且也充分吸收他国尚武传统，并以此作为尚武精神培养的思想资源。“开民智”所倡导的“智高于仁”的理念，则是对传统文化中“仁智合一”“以仁统智”的仁智关系的颠覆。理性第一次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且高于“德”的地位。新的仁智关系的确立为近代理性精神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逻辑精神与理性自由的重建。而“新民德”即近代伦理精神的重建，则是以自由为根基，以利群之德为主要内容，以国民意识为其灵魂的重建过程。

第三章，“新民”思想的现实选择。作为对近代感性生命、理性精神和伦理精神重建的“新民”思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鉴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新民”思想势必要选择一个现实基点作为突破口，这样，改造国民性，无疑成为“新民”思想的现实选择。对国民性的改造是建立在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的。近代思想家以其犀利的语言和深刻的自我剖析精神，对国民的奴性和群体意识的缺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中包含着对个体权利与尊严缺失的关注，以及对国家这个最大国群的关注。在思想家们看来，国家的贫弱，正是由于缺乏权利意识与群体意识造成的。这样，他们就开始了权利意识与公德意识的培养和塑造过程，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中权利观念的挖掘来为其提供可供利用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新界定公私关系，并最终把“私”导向“公”。同时，他们还力图通过道德革命来塑造公德意识，以此来实现对国民性的改造。

第四章，“新民”思想的逻辑进路。应该说，戊戌维新时期

的“新民”，始终是在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之新民，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使得自由、权利等价值观念只是达至国家富强的手段，并没有成为目的。而到“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思想家们的视野在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动中得到空前的拓展。正是基于此，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人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开始呈现为一种双向影响与双向互动的关系。这时，被国家遮蔽的个体开始逐渐解脱出来，个体的自由、权利开始得到彰显。而自由和权利，无疑凸显了个体的人的存在，使得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而是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个体之新民，而新青年无疑成为个体之新民典范。

第五章，“新民”思想的发展。应该说，通过追溯毛泽东在“新民”思想上的心路历程，可以进一步理解其从“五四”到当代的发展。“五四”前后，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毛泽东就已经将“变化民质”视为是大本大源，并将精神自我的形成视为“变化民质”的基础。由此，他采取了教育新民、新民学会等一系列措施作为改造“新民”的途径，力图实现对精神自我的塑造。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把造就共产主义新人作为精神改造的目标，由此提出了塑造“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号召，并力图通过“文化革命”来彻底实现对人的精神改造。但由于其过于强调精神而忽视对人的个体合理欲望的肯定，最终这种“文化革命”沦为场文化的浩劫。而邓小平则在肯定人性，肯定人所具有的合理欲望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在充分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在物质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当下社会，人们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精神的存在，他们试图通过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需要来满足自己为他人所承认的需要，因而，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当代公民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公民、公共精神以及公民社会无疑成了“新民”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主题词。